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研究丛书

迎接党的十九大精品出版选题

中国共产党 怎样解决发展问题

吴波 董磊◎著



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解决发展问题的
中国发展完全打破了西方理论
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什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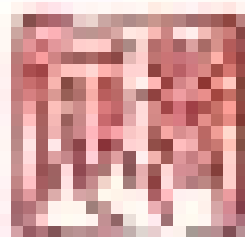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问答

10000 个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问答》编委会

中国共产党 怎样解决发展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问答》编委会



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好的中国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现代国家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什么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内政



中国共产党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研究丛书

迎接党的十九大精品出版选题

中国共产党 怎样解决发展问题

吴波 董磊◎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发展问题 / 吴波, 董磊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11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210-09884-3

I. ①中… II. ①吴… ②董…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2601 号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发展问题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研究丛书”)

作 者: 吴 波 董 磊

策划组稿: 游道勤 余 晖

责任编辑: 王一木 魏如祥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8612505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01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0 千

ISBN 978-7-210-09884-3

赣版权登字—01—2017—8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52.00 元

承 印 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革命:打开中国发展通道的钥匙 /1

- 一、打开中国发展通道的曲折探索 /1
- 二、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开辟 /5
- 三、关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争论 /8

第二章 中国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12

- 一、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12
- 二、毛泽东的发展论 /22
- 三、新中国前 30 年道路探索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29

第三章 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开创 /38

- 一、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原则 /38
- 二、邓小平的发展论 /45
- 三、松绑发展的主要举措与若干发展矛盾分析 /54

第四章 中国发展道路的奋力开拓 /65

- 一、自身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双重探索 /65
- 二、江泽民的发展论 /75
- 三、两大发展举措与理论思考 /82

第五章 中国发展道路的自我超越 /92

- 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新探索 /92
- 二、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认识的深化 /100
- 三、胡锦涛的发展观 /110
- 四、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道路的自我超越 /117
- 五、科学发展观与党的建设的积极探索 /128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发展的战略沉思 /136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辩证认识 /136
- 二、中国发展面临的世情与国情 /144
- 三、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战略沉思 /152
- 四、中国发展面临的党情 /161
- 五、中国发展领导力量建设的战略沉思 /169

第七章 中国梦与中国发展探索的阶段性主题 /177

- 一、中国梦的内涵与价值 /177
- 二、中国发展探索的阶段性主题 /190

第八章 中国发展道路的崭新高度 /206

一、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 /206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突破 /223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37

一、深入理解新的发展阶段的双重维度 /23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242

三、正确认识关涉新的发展阶段重大论断的若干关系 /246

四、新的发展阶段重大论断的意义与价值 /251

主要参考文献 /255

第一章

革命:打开中国发展通道的钥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发展,这个概念也由此成为当下的一个热门词汇。总体上说,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有三个基本原则需要加以把握:一是要将之与新中国的发展史进而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史相联系。了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这个历史时期,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二是要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中国革命问题是讨论中国发展问题的前提性问题。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分析,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就丧失了深层的基础。三是要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作出深刻的揭示。如果离开了这一领导力量的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曲折探索的历程就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一句话,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发展史。

一、打开中国发展通道的曲折探索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长时间领跑的东方大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5世纪以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达程度远高于西欧,即使到了19世纪初,商品生产和流通仍然生气勃勃,非西方所能媲美。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①美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这样具体描述道:1800年的中国,庞大的中国航运船队来往于长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国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艺品运到满洲,而将那里的大豆和毛皮运到南方。早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经计算过,19世纪40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数超过伦敦港,而当时伦敦已是西方贸易的中心。^① 根据中国学者的考证,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构成的比例也从22.3%上升到32.9%。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占世界总量的22.9%上升到36.6%。^②

然而,这一切所展示的只不过是这个天朝大国夕阳西下的辉煌而已。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不仅迅速超过了中国,也超过了欧洲大陆诸国,开始冉冉升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8世纪下半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始于毛纺织业,进而扩及丝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然后又迅速扩及交通、采矿、冶金、制造等各个工业部门,工业迅速超越了农业的经济地位,有资料表明:到1860年,英国的人口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但英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3%,煤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棉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20%,拥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业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亲眼目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跨越式的发展后的感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④

① 参见[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89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② 转引自戴旭:《疯狂追求GDP:中国战略产业全面空心化》,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10年第1期。

③ 韩民青:《从宇宙观、人类观到发展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西方资本在国家力量的支持和保护下,开始远涉重洋,寻求更大的利益。面对日渐衰落的中国,他们露出了贪婪的目光。也可以这么说,东方是被西方发现并带入现代化进程的。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在西方列强一次次的侵略中,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一败再败,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最终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捕获物,中华民族陷入了极其悲惨和屈辱的境地。

面对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危机,封建统治集团内的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曾发起了诸如洋务运动等自救的努力。他们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期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以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这场自强运动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告终。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中国的农民阶级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起义,这些努力虽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企图,但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最终也失败了。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下,中国始终发展不起来,处于一种贫穷、落后的衰败状态。正如马克思说:“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①

19世纪末,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试图通过自上而下改良来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1896年,22岁的梁启超创办了《时务报》,鼓吹革命。第二年,他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招收了四十几个学员,这些学员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骨干。在时务学堂期间,学员们的作业基本上都鼓吹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898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并没有提出革命的主张,连君主立宪的字眼都没有出现,而是期望依靠改良的逻辑试图推动清王朝的自新,试图“跪着造反”。然而,即便如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光绪皇帝还是明确地对严复说,你们那一套我基本了解,但是有一条基本原则,朕的权力一点都不能少。由于遭到清朝统治集团内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维新实践不过百日便迅速失败了。

一次又一次失败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尝试,以及旧式的农民战争,不可能让中国发展和强大起来。胡绳对此有过深刻揭示。他指出,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和工业化、民主化的中国。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加落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若想发展起来,中国只有民主革命一条路可走。历史选择了孙中山。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的。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被毛泽东称为“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他领导的革命派彻底放弃了改良的幻想,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试图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复兴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革命的胜利终结了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

但是,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最后以与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社会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障碍依然没有革除。孙中山在目睹革命后的情状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已经清晰地觉察到,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大的社会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选择新的道路。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页。

为克服革命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几经挫折后,孙中山开始寻求实行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政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代替了旧三民主义,这一理论创新把国民党由一个悬在空中的政党变为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从而巩固并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抛弃了“新三民主义”,大革命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中国发展之途依然处于漫漫黑夜之中,呼唤着新的领导力量给予光明,照亮前行的道路。

二、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开辟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把“反帝”和“反封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真正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对此深刻论述道:“中国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需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①

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能够分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酿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大革命之所以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大革命的失败,并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起点。中国共产党人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行。

在毛泽东看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只是整合了社会的上层,而当时的中国必须整合中国的下层。只有将中国社会的下层即农民整合起来,才能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陈独秀之所以跌倒,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农民问题。1956年,毛泽东讲,我们一开始搞革命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平面地看农村,后来有了唯物史观,我们才知道立体地看农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农村,革命才搞成功的。后来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总结了五句话,即:得农民者得天下;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得到了农民;谁得到了农民,谁就得到了中国。^②

在系统而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此为指导成功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道路。

这个理论明确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由这一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因之发生了重大转换。毛泽东指出,在这以前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② [美]斯诺:《斯诺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领导力量,不再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前途,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与前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相比较,其超越性体现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两个方面。关于第一个方面,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其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了这个阶级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和实现民族独立的能力,历史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推上了革命领导力量的关键位置。关于第二个方面,实践证明,为了取得民族独立,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唯一可能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替代,实现从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历史性跨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依靠这“三大法宝”,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处于全球资本统治边缘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一次成功突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始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围绕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上下求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正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彻底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真正打开了中国现代化的通道。

三、关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争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展示和反映的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个性特征。在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诸如救亡与启蒙关系的问题、革命与改良关系的问题、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关系的问题,是近些年来围绕中国发展道路出现的主要议题。

1. 救亡与启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五四以来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讨论。有人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救亡”压倒了“启蒙”,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五四以后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了‘以俄为师’的岔路”。有人将新中国的历史视为“不堪回首”,要求“树立这样一种历史纬度,1949是一种堕落”,强调应该“删除1949,恢复1911”,要“从一个根本尺度上抹掉”。

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启蒙理性,正是启蒙理性给予了中国文化釜底抽薪般的冲击。面对关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先救亡还是先启蒙,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以首先解决现代化问题为突破口,并没有解除

这种落后和挨打的恶性循环,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谈得上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启蒙话语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脱离了下层广大群众,它始终处在边缘地位。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首先是启蒙脱离了救亡,以为只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面对中国的危亡局势,只从抽象的人性及其权利出发,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性质。^①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把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加以认识。救亡并不是在启蒙之外,恰恰是启蒙本身的内在要求,救亡要求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思想启蒙的历史动因。^②

2.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前些年,有人曾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抽象地否定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价值,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历史意义。评价一场革命和一个政党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应当与其在当时最重要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相联系,而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出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导致金融破产,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发起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给美国国务院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可以作证,许多以前强烈地反共亲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正在提出跟共产党一致的意见,而大多数美国人也和他们不谋而合。”“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想象:如果我致力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 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以成事。”在中国“只剩下了革命的唯一出路”,“我在1944年带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

① 参见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② 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

产物……这种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我真诚的信仰。”“从1943年起我就认为革命在中国可能是势所难免的,1945—1946年城市经济的崩溃,国民党政权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对人民的镇压更坚定了我这一看法。”^①

费正清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革命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同时,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选择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别的什么力量。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人民群众在比较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两者的统一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

3. 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的关系

现代化这个概念并不单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观念,现代化本身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方式征服和瓦解东方民族、实现国际资本统治的主要手段,是西方世界寻求建立普遍价值理念的产物。所以,它比之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战争形式进行的公开暴力掠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美国学者雷迅马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中指出,现代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中融汇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对美国改变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物质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有缺陷的地区——的能力的一组共同的假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现代化作为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这一概念和研究范式的提出,“直接挑战了作为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观念”,由此导致对革命范式的颠覆和解构。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不仅否定了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而且会导致这些国家放弃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主动性。正如有学者精辟指出:“现代化的提出是西方资本主义再度占据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的结果,因而作为当今世界历史理论的

^① 参见[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32、336、340—341、382页。